

格
拉
斯
文
集

GÜNTER GRASS

蟹行

IM KREBSGANG

〔德〕君特·格拉斯 著 蔡鸿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16.4/20+3

2008

蟹行

IM KREBSGANG

〔德〕君特·格拉斯 著 蔡鸿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蟹行/(德)格拉斯(Grass,G.)著;蔡鸿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书名原文:Im Krebsgang

ISBN 978-7-5327-4497-8

I. 蟹... II. ①格... ②蔡...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7670号

Günter Grass

IM KREBSGANG

Copyright ©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2002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09-2002-492号

格拉斯文集

蟹行 [德]君特·格拉斯著 蔡鸿君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易文网: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28,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100册

ISBN 978-7-5327-4497-8/I·2546

定价:1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0571-85155604

格拉斯谈《蟹行》

2002年3月25日至27日,译者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参加君特·格拉斯先生召集的中篇小说《蟹行》翻译讨论会期间,专门采访了格拉斯先生。采访是在格拉斯先生的办公室和举行《蟹行》翻译讨论会的会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故居“布登勃洛克之家”进行的,采访录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

蔡鸿君:今年2月,您的新作《蟹行》出版并且在德国引起轰动。您曾经说过,您始终是用文学这个工具,通过叙述故事,达到教育(aufklären)的目的,让后来的人了解德国的过去。您认为,这也是您这一代人的任务。

格拉斯:这本书的主题,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选择的,

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就像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从我开始写作,它就伴随着我,迄今仍未了结。对我来说,就是尽力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在欧洲,教育孩子的情況是不如人意的。我认为,由于教育而造成的损害,只能通过教育才能消除。非理性行为的再度出现(Rückfall des Irrationalismus)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坏的情况。《蟹行》这本书的主题实际上早就出现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里,书里有两个章节,一个章节《蚂蚁大道》是写苏军开进但泽地区,苏军官兵的强奸和暴行,另一个章节《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写的是德国人在不久之后遭到驱逐,乘货运车逃难,难民们在货运车上遇到抢劫,这两个章节是我的书长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准出版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铁皮鼓》。我希望,我的新作在今天的俄罗斯能够引起注意和讨论,前来参加翻译讨论会的俄文译者证实,这场讨论已经开始了。

蔡鸿君:关于这本书的主题,许多评论认为是突破了禁区,提到君特·格拉斯,人们都会想到,这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左派作家。

格拉斯:关于突破禁区的说法,要说只适合于分裂的德国。在过去的东德,这个主题是不得触及的禁区,当时东西德甚至有不同称呼,在西德说“难民”或者“被逐出家园的人”,在东德则被婉转地说成“迁居者”。在西德,这个主题被挤到一边,主要表现的是其他的主题,比如说,德国犯下的罪行,后来这个主题则被遗忘了,从这一点来讲,突破禁区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许多报刊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

称为“难民船”，把这场海难和战争犯罪等同起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是一场灾难，而不是犯罪。当时仍在交战，而且船上还有许多军人，苏军潜艇指挥官下令击沉该船完全是正确的。不少评论不惜笔墨地大讲“难民船”，其实，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知道，作者的重点并非在此。不少评论写得很匆忙，我注意到，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地方性报纸上的评论文章更注重讨论作品的文学性，而《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则是继续发泄对我的旧仇积怨。很多评论对我的作品并不怎么关心，而是更关心我的政治观点，甚至有人要求我把嘴巴闭上。

蔡鸿君：《蟹行》(Im Krebsgang)这个书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格拉斯：我不想用《www. blutzeuge. de》(书里出现的一个纳粹网页——蔡鸿君注)或者《“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等作为书名，使用现在这个书名完全是从小说的叙说方式出发的，在时间的安排上，在叙述的安排上，有平行，也有交叉，书里小说主线的叙述与螃蟹的行走方式很相似。“蟹行”在德语中是一个常用的词，只是表明一种运动方式，我想，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蟹行”这种说法，书名的意思就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完全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贬义，只是指叙述或者写作的方式，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倒退，有时交叉，有时平行，穿插了三个真实人物的生平和一个虚构人物的故事。

蔡鸿君：在翻译成中文时，是否可以将介词 Im 撇开不译？

格拉斯：当然可以。

蔡鸿君：您将这本书归类为“中篇小说”，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坚持这么做的原因吗？

格拉斯：这本书写的是非同寻常的事件（außergewöhnliches Ereignis），甚至是双重意义上的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层是这条船的故事，一直到它沉没，非同寻常的事件是叙述者在船沉没的短暂时间里，在前来救援的“雄狮号”上出生，另一层是，在因特网上捡起这一主题的那个极右青年，竟然是他的儿子。接着，事情更加复杂化，最后重现了开始时的谋杀情节，使小说再次达到高潮。我认为，它具备中篇小说的等级，具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的等级。但是，由于幽默的原因，稍微也有一点破例，因为，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始终声称自己在写一篇报道，而且他总是把报道的风格加入进来。这两种形式，即中篇小说和报道，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竞争的关系。一边是报道的语调，一边是叙述的语调。对于我来说，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和我这个作者之间在书中进行的争吵，很有吸引力。我把这本书当作一部中篇小说，他却坚持认为是在写一篇报道。

蔡鸿君：《蟹行》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现在才写？”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现在要写这本书？

格拉斯：我的每本书的第一句话往往决定了这本书的调子，我从来不改第一句话。《蟹行》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长期以来，在德国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驱赶前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和一千多万人逃难的主题，在西德被挤到一边，在东德根本就不准提及。这也是我本人生

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您知道,我在 1927 年出生在但泽,我的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专卖殖民地产品的小店,1945 年 1 月,我作为空军辅助人员在科特布斯负了伤,曾建议我的父母乘“维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西部,他们当时没有走,而是在夏天被苏军驱逐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其他的灾难、失职和罪过。在《蟹行》这本书里,图拉的儿子直到 50 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着手从他自己的角度写这些母亲已经督促了几十年的往事。他在因特网上找到了极右分子搞的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网页,这才真正开始写他的报道。人们只要在德国的东部或者西部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只有很少的人听说过“维廉·古斯特洛夫号”船和这次海难。维廉·古斯特洛夫是什么人,是谁把他打死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一切几乎没有人知道。因此,我在书里讲述了“维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下水到沉没的历史,也交代了计划建造和命名的经过。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前的。新的纳粹分子与光头仔不同,他们可能在高级文理中学甚至在大学里。抵制新纳粹主义,必须持之以恒,我也努力用我的方式,即小说家的方式。

蔡鸿君: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被称为是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海难的故事。这似乎是一种很好的广告。

格拉斯:这与出版社毫无关系,是评论文章里这么写的。“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虽然在书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主人公康拉德也在因特网上为此与人争吵,但是,这绝不是写这本书的动机。

蔡鸿君:这么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并不是《蟹行》的中心

主题。

格拉斯：当然不是。我在书里有意识地并没有只写“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而是还写了这一事件之前的许多事和相关的人物生平，从维廉·古斯特洛夫的发迹一直到他1936年被杀，然后是医学院学生、犹太人大卫·法兰克福特的生平，他进行刺杀的过程，在瑞士坐牢，战后去了以色列，还有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的故事，从他在奥德萨的童年，写到他指挥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战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当然，这些生平传记都是依据“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按照这条船的命运，进行编排的。书里还有一个虚构人物，是我从过去的书里拿来的，图拉·波克里弗克，她最早是出现在我的中篇小说《猫与鼠》里的，后来又在长篇小说《狗年月》里得到扩充，她现在又被写进了《蟹行》。这样，我就拥有了进入这些历史素材的文学通道。对我来说，最初这只是一堆没有经过梳理的素材，许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要把它们写出来，而且必须写出来，但是，直到我想到让图拉这个人物出场，我才找到了处理这些素材的文学通道。

蔡鸿君：您写这部小说时，是否想到过某一个特定的读者群？

格拉斯：总的来说，没有想到过哪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但是，我也很清楚，“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战后难民逃难，对德国的年轻一代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即使有些人知道“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但也不了解这条船因此而得名的维廉·古斯特洛夫这个人，不知

道他是德国纳粹党瑞士分部主席,在瑞士的达沃斯被德国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身亡。有一个叫海因茨·舍恩的人,曾经出过两本关于“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书,我写《蟹行》时参考过他的书。前几天在莱比锡,我第一次见到了舍恩,他比我大几岁,舍恩当年是“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水手,在海难中侥幸获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开始收集有关“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的材料,他甚至还去苏联找到了那艘击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军潜艇的几个幸存的水兵,并且和其中的一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留下了许多合影。当年,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经八百的出版社,最后他的两本关于“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书是由一个出版军舰图书的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其他书还在一家主要出版右翼读物的出版社出版。他本人并不是极右分子,但是他听任自己被极右分子利用。我在见面时问他为什么会在右翼出版社出书。他说,他事先并不知道,等书出版了以后,才发现他的书处于怎样的一种环境之中,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他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一代老人中间是很典型的。这也说明,正经八百的出版社不敢出这类主题的书。假如是由一位好的责任编辑来编辑出版,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那么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也许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蔡鸿君:那样就太可惜了。书里关于什未林的地理环境写得非常详细,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格拉斯:是的,写作期间,我多次去什未林实地考察,寻找故事应

该在哪里发生最合适,走了好几条街,看了几个后院,书里写的房子和门牌号码都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那些纳粹纪念碑的基石残余物,也确实仍然存在,我感到很惊讶,在东德的政治环境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蔡鸿君:书里有大量计算机和因特网术语,如网页、上网、虚拟空间、聊天室,等等。据我所知,您甚至一直使用传统的机械打字机写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把因特网这种媒体写进了您的小说?

格拉斯:我的确不用计算机,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反对使用计算机。我的担心仅仅是,计算机是否会成为进行交流的唯一的工具。年轻人把计算机当成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恰恰在年轻人中间,被称之为交流的东西,正在转向因特网,转向一个虚拟的世界。在我的书里,在图拉的儿子叙述故事的同时,极右分子把“维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也搬上了因特网。

蔡鸿君:您曾经说过,在写《我的世纪》时,您最初是想从一个老年妇女的角度来叙述,但是刚写出一些提纲,您就觉得这个角度太窄,放弃了这种构思,改成由许多不同的人物,以“我”的口吻,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反映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您在写《蟹行》时,是否也有类似改变构思的情况?

格拉斯:没有。我总是先写出提纲,然后才开始写。我的历史顾问为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大约有半米高,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看资料,然

后用了九个月写完。第一稿是用手写的,然后用我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写了第二稿。

蔡鸿君:您仍然是站着写作吗?

格拉斯:是的,我经常站着工作8个小时,这与我最早学的是雕塑专业有关,而且是一边写一边大声读,反复琢磨句子,直到它们不仅仅是书面的存在,而且可以朗朗上口。

蔡鸿君:《蟹行》是您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写的第一本书。您是否在写作时感到有负担,想写得更好一些,给世人一个惊喜?您是否对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和成功感到意外?

格拉斯:我在写作时完全忘记了获奖的事,写作是一个紧张的过程,获得了诺贝尔奖也依然如此。当然,外界的期望会更大,这我也很清楚。

蔡鸿君:参加这次翻译讨论会的俄罗斯译者证实,这本书在俄罗斯已经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这本书可能会在俄罗斯引起争议,也许前苏军老战士会认为受到了伤害,您是否想到过这一点?

格拉斯:这是我也无法改变的。这本书即将在俄罗斯出版。但是,如果认真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绝不是写这本书的动机。德国对世界犯下了许多罪行,比如,驱逐当地居民,从波兰开始,后来又在乌克兰继续进行,结果这些非正义的行为却又得到了别人的效仿。驱逐当地居民,也包括驱逐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

蔡鸿君:您的译者是您最认真仔细的读者,在这次翻译讨论会上,

您是否通过您的译者,对这本书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格拉斯:我发现,有许多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对译者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欧洲的译者和其他地区的译者,比如说中文的和阿拉伯文的译者,对某些表达方式有着不同的困难。举办这种翻译讨论会是我的主意,最早是在1977年《比目鱼》出版之后,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翻译错误。完全杜绝翻译错误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则可以因此而得到提高。

蔡鸿君:您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作家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所改变?文学是否还有未来?

格拉斯:总的来说,作家所扮演的角色没有改变。但是情况总是在变的,这也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于“不朽”,我们有完全不同的考虑。文学始终伴随着检查、禁止和放逐,同时也伴随着作家的傲慢,他们可以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你这个独裁者,蠕虫会把你吃掉,而我们的书将永存。”但是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自我消灭的境况之中,威胁来自许多方面,而且持久不断。这不是上帝安排的世界末日,而是人类自己准备的终结。不过,我会一直写下去,这也符合我的西西弗斯情结,石头不会停留在山上,我将继续写作。

蔡鸿君:您的许多作品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情,最近几年,美国和欧洲又卷入了战争,从这种意义上讲,您的新作是否想要传递某种信息?

格拉斯：传递某一种特定的信息，当然不是我想要做的，但是书里至少是再一次清楚地展现了战争的恐怖和后果，比如难民逃亡、大批人死亡、驱赶当地居民。今天，战争的方式和战争的起因与过去有所不同，再说，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强大的军事装备，而且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推行强权政治，肯定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国现任总统完全失去了分寸，这种危险性就更大。讨伐恐怖主义的战争被变成了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有将一切分成善与恶两种类型的简单分类，这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突然出现（Einbruch des Irrationalismus）。在危机的情况下，实际上更应该保持理智。人们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完全阻止恐怖主义的蔓延。如果不问问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不可能战胜恐怖主义的。

蔡鸿君：有一些评论认为，这部新作表现的主题，表明您有向右转的倾向，就像几年前马丁·瓦尔泽一样。他们的结论是，格拉斯将趋向保守。

格拉斯：这完全是愚蠢的说法。如果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就会看懂作者的意图。我认为，也必须克服存在的左倾的盲目无知（linke Blindheit）。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主题，这个重要的主题，交给极右分子，其实这也是左翼自己的疏忽失职，把这个主题放到一边，避而不谈，那么右翼则将它送到因特网上去了，因此，我站在我的左派立场上来写书进行反击。

蔡鸿君：有人把您称作是“国家的良心”，您是怎么看待的？

格拉斯：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我和海因里希·伯尔一直反对把我们称为“国家的良心”，因为，这种良心要从别的地方拿来，再分配给作家，而作家是没有权利去贯彻实行什么的。因此这是毫无意义的。

蔡鸿君：您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参与政治，在德国历来颇有争议，但却受到许多中国同行的称赞。不少中国作家主张，作家不应该坐在象牙塔里为少数人写作，而应该针砭时弊，干预时政。

格拉斯：请您不要忘记，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对中国的政治积极参与，我也会在中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先知在自己的国家不被人所重视。

蔡鸿君：德国年轻一代作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写反映政治主题的作品，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情况的？

格拉斯：我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年轻作家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尝试，我当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政治是很贪婪的，我很快就觉得，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年轻的作家有一天会发现，他愿意写的爱情故事或者感情纠葛，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里的，而这个社会又要受到某些政治的约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政治总要表现在他的感情纠葛里，在他叙述故事的同时反映出来，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后，在现实中，政治便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我当然感到很遗憾，我今年就要满75岁，我希望能够有几位年轻作家来减轻我的负担，但是，现在还看不出这种迹象。

蔡鸿君：《蟹行》这本书在文学性、艺术性、政治主题等方面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您认为,在当今社会,什么是文学最重要的功能?

格拉斯:我认为,我写的东西是与我个人独特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完全专注于个人内心生活的书,不仅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文学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我反对诸如“政治文学”的说法,即使有些作家完全远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绝对不会期望所有的作家都要具有政治责任感,同样我也不会认同作家应该退回到象牙塔里去的观点,这也是荒谬的。当然,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一些国家很幸运,它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意识形态诱惑,文学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即使这些文学常常会乏味无聊。在德国,即使是一些年轻作家,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会发现又触及到了他们祖父那一辈的踪迹,这是一段相对来说不算长的12年纳粹统治时期,但是它的后果一直延伸到上个世纪末,并且将会延续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时间跨度,这个主题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可以理解,有些人总是说,现在应该结束这种关于过去的讨论,我们应该关注现实,不要再纠缠历史,从“零点”重现开始。可是,过了几个月,又会出现与纳粹时期有关的问题,比如关于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工”,历史又浮出了水面,让人们面对,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过程。我从来就不信任这种过于迅速的和平条约。

慕鸿君:您总是一边写作,一边画画,在写《蟹行》的过程中,您是否也画了许多螃蟹?

格拉斯：只画了用在封面上的那一幅，这是一种淡水蟹，据说是从中国来的，它们吸附在船底，飘洋过海，来到欧洲，繁殖得很快。您应该把几只这种从中国来的螃蟹再带回中国去。现在我又换了工具，主要做陶土雕塑，全是跳舞的男女。

蔡鸿君：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您的主要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您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的许多文化机构，其中有中国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邀请您在合适的时候再次访华。

格拉斯：非常感谢，不过您知道，我今年就要满 75 岁，中国这么大，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好好进行准备。今年 5 月底，我将要去韩国和朝鲜一周。

蔡鸿君：您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做短暂停留？比如在北京大学做一次演讲？

格拉斯：看来是不可能的，演讲必须要事先写好才行啊。再说，此次韩国和朝鲜之行本身就是增加出来的，因为歌德学院邀请我去韩国，我提出，我要去，就既去韩国，也同时去朝鲜，结果他们竟然真的安排妥了。

蔡鸿君：我知道您读过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金瓶梅》。我想问问，您是否也读过中国现当代新的文学作品？

格拉斯：我是读过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仅仅是《金瓶梅》。至于现当代文学，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新的，有一位中国很著名的作